

《東華漢學》第 28 期；101-144 頁  
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8 年 12 月

## 論《金瓶梅》的巾帕敘事<sup>\*</sup>

陳福智<sup>\*\*</sup>

### 【摘要】

巾帕作為《金瓶梅》的物質敘事之一，自然有其特殊意義，並且與其他物質敘事有所呼應，形成笑笑生的敘事風格，呈現其世界觀。在笑笑生筆下，巾帕的敘事意義首先是物質性的，其具體表現在於，一方面是擦拭、包覆的實用性功能的物品，使用過程也與其他物質發生緊密的關係，構成了物物相連的物質世界，另一方面巾帕成為有價格可計算和販售的貨物，是人際間彼此互送和交換的常見財物。巾帕其次是精神性的，不僅讀者可透露禮物性贈送時所帶來的人物心意，重要的它更是見證戀人私密關係的情感信物，是《金瓶梅》人物承接或表達心意和情意的載體之一。雖然《金瓶梅》中巾帕敘事表現物質性和精神性的兩面特質，總體來說，物質性佔有絕對性的主導和影響，除了精神性通常混有偏向物質性的色彩外，最關鍵的在於，巾帕的使用無法改變人物的精神

---

\* 本文曾於臺灣師大主辦「2017（台北）金瓶梅青年學者論壇」（2017年04月）宣讀，再經增修後投稿，過程中，承蒙不少小說研究前輩的提點與指導以及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申謝。

\*\* 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意涵，精神性僅是曇花一現，人物主要仍然服從物質力量。巾帕敘事或可視為笑笑生對世俗世界的根本觀點，雖然精神存在於世界，根本地說世界卻是由物質所主導和發展的。

**關鍵詞：**巾帕敘事、金瓶梅、世界觀、物質敘事

## 一、前言

中國古典小說家引用早先素材，是普遍的現象，根據韓南的研究，《金瓶梅》源自《水滸傳》、「白話短篇小說」、《如意君傳》和宋史與戲曲、說唱文學。<sup>1</sup>然誠如浦安迪試圖論證的，有的小說家並非單純引用，而是加以再創，<sup>2</sup>以符合小說的內在一致性和主題統一性，由此闡述思想題旨，唯有如此，小說才能形成獨特性的敘事風格和敘述視野。

《金瓶梅》前幾回，笑笑生<sup>3</sup>實多抄自《水滸傳》，恐怕無法顯示其匠心，令人眼睛為之一亮的是所增添的新內容，如以下：

婆子道：「你們兩人，出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拿著，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第四回，頁55。）<sup>4</sup>

<sup>1</sup> 美·韓南著、王秋桂譯，《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金瓶梅探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223-264。

<sup>2</sup> 美·浦安迪著、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頁47-153。

<sup>3</sup> 笑笑生為目前《金瓶梅》標記的作者之名，其真實身分與生平學界尚未有定論。浦安迪在專書《明代小說四大奇書》粗略概述幾種可能與問題；近來周鈞韜重提王世貞說，〈重論《金瓶梅》作者王世貞及其門人聯合創作說〉，《河南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5卷第2期，2014，頁181-188。本文使用「笑笑生」的目的在於，強調小說家對於小說敘事的作用，同時為「以物為主」的世界觀，找尋一個真實小說家，因此笑笑生究竟為王世貞或李開先或者《金瓶梅》何時出版，並非本文意圖解決的課題。換言之，笑笑生在本文僅是《金瓶梅》小說家代詞，此人真實身分及其時代性不在討論之列。《金瓶梅》的時代，魏子雲有詳盡的討論：「實際上，這部小說的歷史背景，乃晚明也。以宋寫明者也。」參氏著，〈從《金瓶梅》例說小說的史地問題〉，《書目季刊》卷31第1期（1996.6），頁17-30。洪城從晚明史實角度，論證小說時間應為萬曆二十一年到三十二年之間，參〈《金瓶梅》是萬曆中期作品〉，《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9年第1期，頁78-82。根據這些研究成果，本文將作品定位為晚明的萬曆時期。

<sup>4</sup> 本文引文若未特別標註說明，皆出自明·蘭陵笑笑生著，梅節校訂的《金

《水滸傳》中此事，施耐庵僅敘述王婆交代幾句叮嚀的話語後，眾人各自散場，未見「表記物件」一事。「表記物件」的敘事自有文學或文化等歷史背景可考究，自中、晚明以降，信物成為戲曲和通俗小說常見的敘事道具，<sup>5</sup>承此，上述文字或可視為當代文學風潮的影響，無法稱上獨具的敘事特點。值得注意的，笑笑生為兩人挑選之物「金頭銀簪」和「巾帕」<sup>6</sup>，從全文來看，不少情節發展和人物表現，都與兩物相關，尤其隨著敘事發展，兩物的形象有所變化。<sup>7</sup>以巾帕為例，潘金蓮委託玳安送花箋，花箋「寄生草」詞中便有「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對人物來說，巾帕代表的意義和情感有關，類近馮夢龍小說中，張浩和鶯鶯之間的香羅。<sup>8</sup>在另一處，笑笑生卻如此敘述「巾帕」：

李瓶兒恐怕帶出血來，不住取巾帕抹之，西門慶抽拽了一個時辰，兩手抱定他屁股，只顧揉搓，那話盡入至根，不容點毛髮。

臍下毳毛，皆刺其股，覺翕翕然暢美不可言。（第五十回，頁751）

此處「巾帕」並非前段所述情感之信物，而是一般實用功能性的擦拭布料，並和淫水、血水等物質產生了關聯性。上述兩者皆是《金瓶梅》中

---

瓶梅詞話》（臺北：里仁出版社，2007），文後提及小說內容僅標回目或頁數，不再加註出處與頁碼。版本的選擇標準不在詞話本和繡像本的始祖源流或版本之間的影响問題，而是詞話本的細節更合乎本文分析敘事的目標。

<sup>5</sup> 相關具體事例可參呂堃，《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信物》（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sup>6</sup> 本文使用「巾帕」涵蓋「汗巾」和「手帕」，一方面是基於笑笑生確切使用了「巾帕」一詞，另一方面在諸多敘事中，汗巾和手帕所擔任的功能和角色是相同的，故合併兩者討論。

<sup>7</sup> 本文希冀論述更為集中，因此暫以巾帕為探討中心。附帶說明，簪子確實起了重要的敘事意義，田曉菲認為：「玉樓、金蓮和瓶兒，每人都曾給西門慶一支簪子（按，此即《紅樓夢》十二金釵的原型），三支簪各各不同……」《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頁45-46。暫不論簪子是否為金釵原型，至少有田曉菲所言敘事上的積極作用，從本文研究巾帕的角度和結論來看，此積極作用是從改編《水滸傳》所新增加的橋段中開始萌芽，最終逐步成為小說的敘事重點。

<sup>8</sup> 馮夢龍，《馮夢龍全集·警世通言·宿香亭張浩遇鶯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小說的香羅和《金瓶梅》巾帕在敘事上仍有異同，參後文。

的中帕敘事，形象卻非齊一，對此形象上的差異，讀者和研究者該如何解釋和認知呢？

對部分論者來說，《金瓶梅》的「巾帕」敘事的意義在歷史性，巾帕敘事的文學修辭和小說主題，並非他們的研究目標。<sup>9</sup>對於寫實小說研究者來說，巾帕敘事是笑笑生創造現實或逼真環境的事物。<sup>10</sup>對於其他以意象角度分析的學者，巾帕具有象徵或隱喻上的意義。<sup>11</sup>歷史性、寫實性或意象性的研究角度，確實有其論述基礎也有相當成果，然本文思考的是，笑笑生究竟從哪些方面形塑巾帕？如此形塑巾帕又反映了何種世界觀？小說家敘述事物自然受到傳統語境的影響，有實驗精神的小說家卻以新方式，闡述新知、見解。順此，小說研究者又該如何辨析小說家對物的新、舊敘事，洞悉小說家的敘事方向和特點呢？這種敘事研究是重要的小說課題，這項課題不僅關乎小說技巧，也關乎研究者能否發現藏在細微末節的新題旨和新觀念。承此，本文試圖論證和分析「巾帕」

<sup>9</sup> 王瑤和姚桂珍以歷史考證的角度分析《金瓶梅》的汗巾兒，參〈《金瓶梅》中的汗巾兒考證〉，《浙江紡織服飾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4年第1期（2014.3），頁63-69。

<sup>10</sup> 鄭振鐸：「另外還有一部很重要的描寫的生動活潑的現實主義作品，就是《金瓶梅詞話》，把其中猥褻之處去掉，就是一部極好的以現實生活作中心的小說。」參《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299。韓南：「我們必須設想它的作者所要達到的目的或縈繞在心頭的目標，肯定導致他拋棄了舊小說的寫作方法，而致力於創作一種新型的小說。這種縈繞在心頭的目標，通常與作者的態度（被說成是一種「現實主義」）或他的主題（「日常生活」、「社會的橫截面」等）是相關的。」美·韓南著、包振南譯，〈《金瓶梅研究》中國小說的里程碑〉，載包振南，《金瓶梅及其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3。

<sup>11</sup> 近現代《金瓶梅》的意象研究成果頗豐，浦安迪是其代表：「對我們賞識個別章回的設計更為重要的是，我想稱它為內在『意象結構』的一面，那就是某些回的涵意意象和其他細節結合成富有詩意的整體。」《明代小說四大奇書》，頁71。浦安迪特重形象疊用，在形象疊用中歸納和指出個別意象的運用及其隱喻。然而意象僅是敘事研究的一個角度，意象敘事強調的是物自身形象中的聯想性，研究物的形象是如何構成情節或情境的印象，物的結構敘事研究則重視情節的發展是如何形塑物的形象，後者是本文「巾帕敘事」所採取的基本立場。

敘事所透露的，不僅是小說家的文學觀或審美觀，「巾帕」敘事的內容更可顯示笑笑生看待事物的觀念，一種「以物為主」的世界觀。

本文採取的是細緻分析巾帕的相關敘事，試圖經此得知小說家對巾帕的認知和見解，並且透過人物和巾帕的運用與互動，探討巾帕所呈現的各種形象，得出巾帕的敘事特點和意義。具體來說，本文前兩節分別探討巾帕的物質性與精神性以建立巾帕敘事的基本內容，末節再綜合兩者，進行兩者關係的辯證，藉此獲知笑笑生在《金瓶梅》巾帕敘事中所呈現對世界的根本觀點。

## 二、實用和財物：巾帕敘事的物質性

小說家身處的世界及其物品，自然會影響到其筆下相關事物的敘事與描寫，因此，若笑笑生對巾帕有一番深刻的體會與認知，這個體會與認知實際上與現實晚明社會中，人們使用巾帕的方式與活動有相當程度的關聯性，假使這個關聯性是真實文本（晚明社會）與虛構文本（《金瓶梅》）幾乎等同或相似，可以說明了笑笑生的寫實創作能力與書寫意識，然而假使關聯性是較為疏遠，反倒可以凸顯笑笑生對於巾帕的獨創性發想與文學美感。相較於晚明的其他服飾研究，巾帕的論述可以說較為零散偏少，陳寶良在百科全書的《晚明社會生活》中，巾帕僅僅被歸為一般服飾，約略地提及：「『巾』原來是指佩，用來拭物，即明代的手巾、汗巾。在明代，汗巾往往是女子贈送情郎的定情之物。」<sup>12</sup>其他的晚明服飾研究也大同小異，多數學者皆以概述方式，簡略巾帕的功能

<sup>12</sup>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219-220。值得注意的是，陳寶良敘述巾帕的開頭，引用了《金瓶梅》中的文字而非其他史料或文獻為論述，若扣除小說太過經典的因素外，另一個原因可能來自於巾帕史料與文獻的欠缺問題。畢竟，從史家的角度，文學作為史料的說服力遠不如其他筆記或文物，文學加太多作者主觀想像。另外，陳寶良對汗巾乃是女子贈送男子的定情之物的解釋，其實受到了文學作品的影響，而非文獻中所載的晚明女子確切活動。

或者引用部分史料，摘要巾帕的不同用詞或種類，整體來說學界較少從文化與社會角度進行研究。巫仁恕透過轎子、服飾、旅遊、家具與飲食等範疇，建構與論述了晚明社會是如何透過消費行動，展現了自我的身分與階級，甚至由此延伸物代表的權力與象徵，這是物的文化性與社會性研究。<sup>13</sup>若順著巫仁恕的研究框架，巾帕範疇也應當有相應的消費活動與商業行為，可以察知巾帕的消費階級及購物行為或意識形態等等的意義，尤其《金瓶梅》中，笑笑生曾憑藉人物陳經濟之嘴，提到晚明巾帕的消費活動：「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花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便多少也有。」（第五十一回，頁774）若小說家虛構的小說內容乃是翻照現實，現實的晚明也理應有一條手帕巷，可惜有關晚明巾帕的實際情況，目前仍需更多的史料搜尋與挖掘，必須累積一定質量之後，才能較為精確地明白其中所隱含的社會或者文化的意涵。

或許正因為欠缺文物與史料，部分研究者將晚明的巾帕研究，建立在虛構的文本如《金瓶梅》或「三言」、「二拍」上。張金蘭的晚明巾帕研究是以《金瓶梅》為主要依據，其將巾帕解釋為：「『汗巾』可作為頭巾，是髮上裝飾物，原為固定髮型時用，以長條狀的絹、綢、羅、綾、緞等高級織物製成，使用時纏於髮髻上或額頭上。後演變為裝飾用途，其中鑲金繡銀等，應有盡有。至於其他作用，則可拭面擦手，或纏於衣服上作為裝飾。」<sup>14</sup>張金蘭的解釋意圖借用文學素材解釋歷史社會之實情，這其實是肯定了小說家的文學筆法，可以達到史料價值；然而，文學與歷史仍然有其界限，即便笑笑生的創作極為寫實，筆下的巾帕仍然僅是其認識乃至構想，與現實中的晚明巾帕，還是有某種程度的距

<sup>13</sup> 巫仁恕，《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北京：中華書局，2008）。

<sup>14</sup> 張金蘭，《〈金瓶梅〉女性服飾文化》（臺北：萬卷樓，2001），頁45。值得注意的是，張金蘭認為汗巾起於頭巾，而陳寶良認為汗巾有別於頭巾。陸錫昌考究明代的巾，然而其所言的巾偏向頭巾意義，和小說中的巾帕（手帕）有別，陸文可以參考，〈明代巾、簪瑣論〉，《南方文物》2009年第2期，頁89-96。這些說法說明了晚明巾或巾帕的概念，仍然有待學界進一步根據更有力量的史料或文獻加以釐清。

離。相較於張金蘭在女性服飾的基礎上略談巾帕，王瑤與姚桂珍對於巾帕研究的企圖更為強烈，兩人不僅嘗試連結晚明紡織產業與《金瓶梅》巾帕敘事的關係，甚至詳盡論述了巾帕的實務功能（擦拭與送禮），還討論巾帕的質料、色彩、圖樣、裝飾等技術性的意義和文化內涵。可惜此論文論述的策略和張金蘭如出一轍，暫不論文中大量的引用《金瓶梅》與其他後於《金瓶梅》的明清小說，他們對於小說的敘事所抱持的觀點乃是歷史性大於文學性，也就是相信虛構的文學之筆可以充分反映了物品的實際風貌，而不是從其他史料來考證《金瓶梅》的巾帕敘事多少部分合乎歷史事實，那些部分屬於虛構。<sup>15</sup>換句話說，這類研究結論通常是『反映論』：「汗巾兒反映出明代物質生活的發達、商業的發達、紡織裝飾技術的發達；反映出人們對華美服飾的欣賞與情感生活的追求；也反映出逐漸盛行的晚明奢侈之風。」<sup>16</sup>從本文的研究角度與成果來看，巾帕在小說的意義遠非僅是反映層面而已。

是此，本文同意深入研究歷史現實的晚明巾帕，是有可能從中獲知文化性、階級性、社會性、歷史性等意涵，研究的成果某種程度也有助於讀者明白與辯證《金瓶梅》的巾帕敘事意義，包括小說所建立的客觀標準與虛構傾向，然而受限當下研究與史料，現階段只能對晚明巾帕的實情，存而不論，將研究專注於小說的敘事分析。<sup>17</sup>

---

<sup>15</sup> 這類從小說見證時代風貌的研究，常見晚明的物品或制度等成為範疇，譬如陳芳，〈從潘金蓮的服飾看晚明世風〉，《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5期，頁80-90。

<sup>16</sup> 王瑤和姚桂珍，〈《金瓶梅》中的汗巾兒考證〉，頁68。

<sup>17</sup> 再次重申，《金瓶梅》的各種物質敘事可自當代文化或歷史進行連結與研究，由此獲知笑笑生是如何反映當代的物質文化及其物質特點，乃至於探討小說的再現美學意義。然而本文並非文化或歷史研究，本文所試圖回答的是巾帕敘事的轉變，帶出笑笑生的世界觀，因此論述僅限於小說敘事表現而論。倘若將來相關研究條件許可，會從本文的參照座標出發，嘗試著從文化與商品的角度，進行真實文本與虛構文本的比較研究，即是論述小說中的巾帕以及其他物質敘事，與晚明文化之關係與異同，希冀由此得知小說中的各種物質敘事對現實中政治、社會乃至於經濟面向的反映與折射。



下文中，本文主要分析巾帕呈現的物質性傾向，其物質性主要在實用性功能形象及財物性功能形象，接下來分別針對此兩個形象的表現，加以析論。

### （一）實用性功能形象

在《金瓶梅》的敘事中，巾帕經常呈現的是實用性功能形象，實用功能主要在包覆、擦拭兩方面。關於包覆，笑笑生是如此敘述：

馮媽媽向袖中取出一方舊汗巾，包著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第十四回，頁199）

玉樓、金蓮每人與了他兩枝花兒；李瓶兒袖中取了方汗巾，又是一錢銀子，與他買瓜子兒嗑，喜歡的賁四娘子拜謝了又拜。（第二十四回，頁339-340）

只見奶子如意兒問李瓶兒說道：「娘沒曾收哥兒耍的那錠金子？只三錠，少了一錠了。」李瓶兒道：「我沒曾收，我把汗巾替他裹著哩！」（第四十三回，頁633-634）

笑笑生如此敘事汗巾的實用功能是極自然，誠如葛霖所言：「手帕最原始、最基本功能就是實用性，為了讓人們生活的更加便捷。它表現在擦拭、包裹、遮蓋、扇風等方面。為了擦拭的方便，人們一般會隨身攜帶一塊手帕，小孩和老人更是如此。有時人們為了攜帶物品的方便，在沒有其他包袋時也用手帕將物品包裹起來。」<sup>18</sup>或正是此寫法讓讀者深刻地感覺小說的寫實性和生活性。然而試將汗巾從敘事中刪除，直接書寫主要對象，句子仍可完成表意，像「馮媽媽向袖中取出四對金壽字簪兒，遞與李瓶兒」。由書寫角度來論，增加巾帕相關敘事似乎畫蛇添足，凸顯笑笑生的繁瑣書寫；然而敘事中仍不忘提及巾帕，可見對笑笑生來說，巾帕有敘事中的存在意義。本文認為此寫法的目的之一在凸顯人物

<sup>18</sup> 葛霖，《論狄更斯長篇小說中手帕的功能》（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13。

和物品的互動關係，探討人物活動過程中，如何運用物品，投射物品對人物而言，究竟是何種存在，這幾乎就是笑笑生在《金瓶梅》的書寫目標：物的世界。任何有助於表現人物和物品的互動關係，包括物品用途、功能、價值和意義等等，笑笑生皆十分留意。田曉菲認為：「《金瓶梅》是一部大書，在這部鴻篇巨制之中，一個字似乎算不了什麼。然而，全書是大廈，細節是磚石，細節是區別巨擘和俗匠的關鍵。無數的細節都用全副精力全神貫注的對付，整部小說才会有神采。」<sup>19</sup>對田氏來說細節書寫是《金瓶梅》敘事上的特色，對本文來說，細節敘事是物品有其清楚形象的必要寫法，巾帕呈現的包覆實用功能形象是其一。

在包覆上實用功能形象的敘事經典，要屬鄭愛月兒贈西門慶的瓜仁兒一事，敘事不僅充分凸顯笑笑生對物品形象的細節經營，更讓細節動作透露人物的內心世界，是物質連結精神的敘事：

西門慶把盒子放在膝蓋兒上，揭開纔待觀看，一邊伯爵一手撾過去，打開，是一方迴紋錦雙攔子細撮穗古碌錢同心方勝結、挑紅綾汗巾兒，裡面裹著一包親口磕的瓜仁兒。這伯爵把汗巾兒掠與西門慶，將瓜仁兩把喃在口裡，都吃了。比及西門慶用手奪時，只剩下沒多些兒，便罵道：「怪狗才，你害饑癆饑瘠，留些兒與我見見兒，也是人心！」伯爵道：「我女兒送來，不孝順我，再孝順誰？我兒，你尋常吃的夠了！」西門慶道：「溫先兒在此，我不好罵出來。你這狗材，忒不相模樣！」一面把汗巾收入袖中，分付王經把盒兒掇在後邊去。」（第六十七回，頁1072）

王經收拾禮盒時，笑笑生特別敘述西門慶將「汗巾收入袖中」的動作，此舉不僅讓人回想起，王婆令西門慶和潘金蓮初次性交後，雙方交換的信物正是「汗巾」。基此而論，笑笑生形塑人物的意念和內心世界的細膩筆法，非一般直接性的突兀插敘和話說等套語，是透過合乎世俗常理的巾帕包覆形象，隨著物品理應呈現的功能，順理成章的衍生精神意

<sup>19</sup> 美·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頁42。

義。換言之，笑笑生敘事的目標或許旨在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情意，所透過的方式卻是巾帕的實用性功能，將情意包覆在巾帕之內和上。從本文的角度，以物質敘事為精神敘事的基礎，正顯現笑笑生敘事的獨特之處。

《金瓶梅》中巾帕的實用性功能形象不僅在包覆，另一個是擦拭，擦拭淫水幾乎成了性愛過程中的套語：

婦人以帕在下不住手搽拭，牝中之津隨拭隨出，衽蓆為之皆濕。  
(第二十七回，頁393)

已而淫津溢出，婦人以帕抹之，兩個相摟相抱，交頭疊股，嗚啞其舌，那話通不拽出來，睡時沒半個時辰，婦人淫情未定，扒上身去，兩個又幹起來。(第五十一回，頁767)

停不多回，婦人兩個抱摟在一處，婦人心頭小鹿實實的跳，登時四肢困軟，香雲撩亂，于是洩出來，猶剛勁如故。婦人用帕搽之，便道：「我的達達，你不過卻怎麼的？」(第七十三回，頁1224)  
婦人情不能當，以舌親於西門慶口中，兩手摟著他脖項，極力揉搓，左右偎擦，塵柄盡沒至根，止剩二卵在外。用手摸之，美不可言，淫水隨拭隨出，比三鼓，凡五換巾帕，婦人一連丟了兩次。  
(第七十九回，頁1377)

笑笑生不斷讓手帕擦拭淫水，使手帕和排泄物和性交產生關連，巾帕的使用數量甚至成為計算性交激烈和次數的物品，五換巾帕可見當次性交之劇烈。《金瓶梅》性愛中巾帕擦拭的並非淫水而已，當西門慶從王六兒家歸來，想再找潘金蓮演練，潘金蓮猜出對方才剛交歡結束，本想「教西門慶下去使水」，「西門慶不肯下去。婦人旋向袖子裡掏出通花汗巾來，將那話抹展了一回，方纔用朱唇裹沒，嗚啞半响，登時啞弄的那話奢稜跳腦，暴怒起來。」(第六十一回，頁956)潘金蓮擦拭陽具之舉動，可證明對笑笑生來說，擦拭何者沒有差異，擦拭才是巾帕最根本的功能和形象。假使上述巾帕和性交所產生聯想的形象和敘事，是多數中國古典情色小說的書寫慣例，不足說明《金瓶梅》的特殊

寫法。<sup>20</sup>笑笑生在敘事中提及巾帕和淚水及非淫水事物的關係，相信更凸顯擦拭的實用性功能形象，如李瓶兒「說著，眼淚紛紛的落將下來時」時，西門慶慌把汗巾兒替他抹拭」（第十六回，頁215）；再如玉樓在潘金蓮墳前上香，不僅難過的說「六姐，不知你在這裡，今日孟三姐誤到寺中，與你燒陌錢布！你好處生天，苦處用錢！」更是「一面取出汗巾兒來，放聲大哭。」（第八十九回，頁152）在這些敘事中，讀者理應當想起汗巾從擦拭淫水轉為拭淚的異同。

笑笑生展示巾帕的擦拭功能有一段經典的敘事：「金蓮見官哥兒脖子裡圍著條白挑線汗巾子，手禮把著個李子往口裡吮，問道：『是你的汗巾子？』李瓶兒道：『是剛纔他大媽媽，見他口裡吮李子，流下水，替他圍上這汗巾。』……」此處汗巾功能一方面可承載口水，也可擦拭嘴角，值得注意的是，潘金蓮的問話及李瓶兒的回話，顯見地在人物心中，汗巾有相當私密性，不可隨亂給予，巾帕的私密性及衍生的親密性和精神性，後文再論。總而言之，擦拭對象或許有別，巾帕的擦拭功能形象卻一致。是此可知，擦拭是巾帕除了包覆外的另一個實用性功能形象。正因為巾帕在《金瓶梅》敘事中，實用功能形象非常自然，使得讀者讀到「婦人在下，蹙眉隱忍，口中咬汗巾子難捱，叫道：『達達慢著些，這個比不的前頭，撐得裏頭熱炙火燎疼起來。』……」（第五十二回，頁780）就不那麼意外了。

---

<sup>20</sup> 如《肉蒲團》：「要曉得，他睡在床頭，聽他幹事的時節，未免有淫水出來，恐怕未央生怕摸著，要譏誚他，所以再洗一次。洗過了，把一條濕手巾揩抹了，又在箱子裡取出一條新汗巾，放在枕邊，方才吹滅了燈，坐在床上。」（臺北：紅螞蟻，1994），頁136。巾帕在性交敘事的反證是，如《弁而釵》：「你替我賺錢，我另眼看你，你早肯如此，我也不打你了，就放了他，教拿水洗浴。」（臺北：台灣大英百科，1995），頁283-284。如《龍陽逸史》：「沈葵纔有些力倦，衮了些白溜溜的物事出來，隨即擦拭乾淨了。」（臺北：紅螞蟻，1996），頁220。

## (二) 指物作價：財物性功能形象

《金瓶梅》常有眾人集資請客的敘事，有回，孟玉樓出主意讓眾多小妾出資擺席，闔家喝酒、賞雪。有趣的是，孫雪娥使出的並非銀子，而是拿根簪子交差，潘金蓮一稱共「三錢七分」。從物品的重量和屬性來論，將簪子當作貨幣功能的敘事，可視為晚明交易市場的共識。實際上不僅是因為重量和金屬的特質讓簪子有類貨幣功能，更因敘事中，帶有錢財性和計算性的傾向，使得簪子呈現「指物作價」的財物性功能形象。除了簪子外，「巾帕」也有類似敘事：

應伯爵道：「可見的俺們只是白嚼你家孤老，就還不起個東道。」於是向頭上拔下一根鬧銀耳幹兒來，重一錢，謝希大一對鍍金網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舊汗巾兒，算二百文長錢；孫寡嘴腰間解下一條白布男裙，當兩壺半壘酒；常時節無以為敬，問西門慶借了一錢成色銀子：都遞與桂卿置辦東道，請西門慶和桂姐。（第十二回，頁154）

這段敘事和孟玉樓邀約眾妾集資請客的情節可說遙遙呼應，同樣表現人情世故的世態，值得玩味的在，笑笑生將巾帕及其他物品，敘述為金錢的用途，刻意標記巾帕與物品的價格，以及道出該物可變現的實情。上述財物性功能的巾帕敘事，笑笑生並非偶而為之，有回，應伯爵郊園會諸友，讀者再次讀到巾帕及其他物品的金錢性和價格性：

白來創道：「如今說了，著甚麼東西？還是銀子。」常時節道：「我不帶得銀子，只有扇子在此，當得二三錢銀子起的，漫漫的贖了罷。」白來創道：「我是贏別人的絨繡汗巾，在這裡也值許多，就著了罷。」一齊交與伯爵。伯爵看看，一個是詩畫的白竹金扇，卻是舊做骨子；一個是簇新的繡汗巾，說道：「都值的，徑著了罷。」……（第五十四回，頁825）

《金瓶梅》中將布料視為金錢用途的敘事，張竹慧從儲藏角度，認為有三個原因：「兌現功能」、「物品取得管道增加」和「保值性高、價格

不易下跌」。<sup>21</sup>以上三個原因或可解釋，晚明社會的交易市場為何選擇以布料為貨幣，卻無法回答笑笑生為何有意的將巾帕和物品敘述為貨幣用途。從本文題旨來論，笑笑生的眼中物品的價值，不僅是一般人所認為的實用性功能，巾帕和物品的另一個重要價值在於，社會和市場所賦予的價格性。換句話說，巾帕和其他物品若可分出彼此優劣價值，有時不在於物品的用途層面，而是物品的價格之高低，價格使得巾帕有了實用性以外的價值。若讀者同意價格高低之比較是《金瓶梅》的敘事特點，以下的巾帕敘事將另有新意：

金蓮道：「不打緊處，我與你銀子，明日也替我帶兩方銷金汗巾子來。」李瓶兒便問：「姐夫，門外有買銷金汗巾兒，也稍幾方兒與我。」經濟道：「門外手帕巷有名王家，專一發賣各色改樣銷金點翠手帕汗巾兒，隨你問多少也有。你老人家要甚顏色？銷甚花樣？早說與我，明日一齊都替你帶來了。」李瓶兒道：「我要一方老金黃銷金點翠穿花鳳汗巾。」經濟道：「六娘，老金黃銷上金，不現。」李瓶兒道：「你別要管我，我還要一方銀紅綾銷江牙海水嵌八寶汗巾兒；又是一方閃色芝蔴花銷金汗巾兒。」經濟道：「五娘，你老人家要甚花樣？」金蓮道：「我沒銀子，只要兩方兒夠了。要一方玉色綾瑣子地兒銷金汗兒。」經濟道：「你又不是老人家，白刺刺的，要他做甚麼？」金蓮道：「你管他怎的？戴不的，等我往後吃孝戴！」經濟道：「那一方要甚顏色？」金蓮道：「那一方，我要嬌滴滴紫葡萄顏色四川綾汗巾兒，上銷金，間點翠，十樣錦，同心結，方勝地兒，一個方勝兒裡面一對兒喜相逢，兩邊欄子兒都是纓絡出珠碎八寶兒。」經濟聽了，說道：「耶嚟！耶嚟！再沒了。賣瓜子兒開廂子打〈口弟〉噴，瑣碎一大堆！」那金蓮道：「怪短命，有錢買了稱心貨，隨各人

<sup>21</sup> 張竹慧，〈從《金瓶梅》看明代社會中常見的資產種類〉，《洄瀾春秋》第八期（2011.10），頁43-59。

心裡所好，你管他怎的？」李瓶兒便向荷包裡拿出一塊銀子兒，遞與經濟，說：「連你五娘的，都在裡頭哩。」那金蓮搖著頭兒，說道：「等我與他罷。」李瓶兒道：「都是一答兒的教姐夫稍來的，你又起個窩兒？」經濟道：「就是連五娘的，這銀子還多著哩。」一面取等子稱了，一兩九錢。李瓶兒道：「剩下的，就與大姑娘稍兩方來。」那大姐連忙道了萬福。（第五十一回，頁774-775）

笑笑生不厭其煩的敘述，人物購買巾帕的材質、花樣和款式不僅是為了反映當代現況，以及人物購買的能力和審美，這樣的敘事更可凸顯市場上影響巾帕價格的幾個因素，最重要的是道出了人物心中巾帕的價格性與財物性。李瓶兒和潘金蓮相較於西門大姐，選擇購買的顯然就是高級款的巾帕。<sup>22</sup>

巾帕包括其他物品皆有價可議，如「奴這床後茶葉箱內，還藏著四十斤沉香，兩百斤白蠟，兩罐子水銀，八十斤胡椒，你明日都搬出來，替我賣了銀子，湊著你蓋房子使。」（第十六回，頁215），連賣屋的剩餘建材也可變賣，「休說木植木料，光磚瓦連土也值一二百兩銀子」，假使人物還債手頭現金不足，可用等值物品抵債，如「當日黃四拿出四錠金鐲兒來，重三十兩，算一百五十之數，別的搗換了合同」（第四十三回，頁632）等等。西門慶有時出題考兄弟們購買物品的實際價格，包括那一條本值百兩的王宣府之水犀牛腰帶，那一座以七十兩收購，原值五十兩或百兩以上的屏風，以三十兩價格購之，這些顯示人物對指物作價的常態。指物作價的高潮是價格因素影響人物的命運，潘金蓮是在八十兩和一百兩的價差中，喪失存活時機。黃衛總認為，價格的數字和白銀敘事成為《金瓶梅》關注的焦點，乃是凸顯了西門慶的商人表現及

<sup>22</sup> 關於指物作價的敘事可以從晚明的物質或商業活動加以研究，然而從本文的角度，同處明代的小說家也並非每位都留意物質或商業活動的意義，甚至在小說的敘事中展現或討論他們，因此本文並不打算深究這類敘事的歷史性與社會性，即是小說內容是如何反映時代現象，或受到社會潮流的影響。

其性格，順此通曉晚明的白銀時代特質。<sup>23</sup>從本文角度來看，財物性價格敘事的意義在於，物品走出實用功能取向，凸顯作為貨物和財物的特質。《金瓶梅》物品皆可議價的敘事特點，某些研究者或視作中國資本市場的萌芽時期，一個金錢觀念突破性發展的時代。<sup>24</sup>不論資本主義萌芽時期的觀點，是否適合詮釋《金瓶梅》的敘事，從敘事而言至少顯示，笑笑生願意正面敘述（非正面肯定）金錢的作用和力量。

學者韋伯·凱恩認為：「什麼應該有價格和什麼不應該有價格，這之間的差別（可讓和不可讓與間的差別）對阿帕杜萊（1986）所稱的價值體系的關係排列至關重要，對威娜提出的有關政治等級的形成的假設也非常重要。」<sup>25</sup>對於中國古典小說家來說，何者在表現過程中可提及價格，何者無須或不可，其實也頗為重要。一般中國古典小說家較少突顯物品價格的意義和作用，價格向來並非敘事重心，縱有價格數字通常並非為了反映現實或物價，而是藉此彰顯使用物品的人物的精神性和主體性；更多的是，小說家直接隱匿價格，物品成為非財務性或價格性的實然存在。《金瓶梅》的金錢及其價值相關敘事有別與此，可說十分坦然，物品價格不僅清晰和仔細，仔細到幾乎可條列價格的表格，「指

<sup>23</sup> 美·黃衛總：「精於數字的西門慶確實是一個擅於運籌金錢的商人。」張蘊爽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慾望和小說敘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頁83。

<sup>24</sup> 劉輝：「西門慶的形象史，正是中國封建社會走向全面崩潰，資本主義商業經濟破土而出這一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發展史，有其豐富的社會內涵，有著巨大的認識價值。」〈《金瓶梅》的歷史命運和現實評價之一：非淫書辨〉，《金瓶梅論集》（臺北：貫雅文化，1992），頁310。陳東宥：「在西門慶身上，突出地體現出十六世紀前後中國商品經濟發展的某些方面的特徵，反映出中國的商業小社會中，處於嬰孩階段的資本者們發展成長的某些特徵。」〈西門慶的生財與消費之道〉，《金瓶梅文化研究》（臺北：貫雅文化，1992），頁165。格非：「簡單來說，他的欲望不僅僅是聲色之欲，更是一種集『慈善家』和『商業英雄』理想人格為一體的形而上欲望——這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倫理的核心內容。」《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頁46-50。

<sup>25</sup> 美·韋伯·凱恩，〈金錢不是物——印度尼西亞社會中的物質、慾望和現代性〉，載孟悅編，《物質文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199。



物作價」的情形更讓不同的物品也能進行比價，凸顯物品之間的昂貴和低廉，道出了物品之間的財物性。具體來說，笑笑生展現的不僅是銀兩等直接性的金錢相關敘事，在一些非直接性金錢敘事，也隨處可見「指物作價」的內容，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巾帕。倘若前述的實用性功能敘事，是多數小說家面對巾帕時的既定印象，那麼笑笑生更是透過價格方面的敘事加強了巾帕的財物性價值，顯示對小說家和人物來說，物品價值不僅實用性功能而已，另一個必須重視在物的「財性」。若讀者同意巾帕和其他物品的財物性，是笑笑生意欲凸顯的敘事後，吳神仙收下布料，便有一個新解：吳神仙縱使能精準預言人物的命運，本身卻仍然受限物質環境；表面上辭謝了西門慶的酬金，實際上卻接受變相的財物（布料），如此神仙最終仍深陷在所有物品都可變現的世界中。

### 三、禮物和信物：巾帕的精神性

一般來說，巾帕屬於個人私密物，《金瓶梅》的巾帕敘事表現卻非個人面向而已，巾帕甚至成為人與人互動（社會關係）的媒介之一，不論是作為禮物或者信物，巾帕是人物經常收受的物品。笑笑生將巾帕作為人物互動時的常見媒介，使得巾帕不僅是物質性的存在，更可透過巾帕的給予感受人物的精神性。然而，人物究竟在甚麼樣的情境底下送出巾帕？贈予的動作又代表了哪些意義？將是本節分析重點。大體而言巾帕雖是傳達精神性與心意的重要媒介，卻因使用者的目的和方向之不同，使得巾帕的精神性呈現程度上的差異。基於巾帕贈出的作用差異，本節細分兩小節，首論禮物，後論信物，期望藉由禮物和信物的兩面分析，以揭曉巾帕敘事隱含的精神性。

## (一) 以巾帕為禮

讀者首知李瓶兒的存在，是送禮者的形象，其派丫環繡春帶著點心、花朵的禮盒上門拜訪，正如月娘所回的：「他送盒來親見你我，又是個緊鄰，咱休差了禮數，到明日也送些禮物回答他。」（第十回，頁133）從塑造人物角度，這段敘事主要是埋下伏筆，藉此預告李瓶兒以物品疏通人情的主要形象，就此之後，讀者幾乎常見其以贈送禮物的方式，拉攏人心、維繫人情的表現；就敘事的內容而言，這段敘事可視為道出《金瓶梅》的重要主題：禮物。禮物是《金瓶梅》中常見內容，潘金蓮為了挽回西門慶，準備上壽之禮；西門慶為了解救陳家帶來的風波，命來保等人帶著禮物來到蔡府找尋門路；西門慶送別蔡狀元和安進士時，更不忘命令小廝，捧出禮物。禮物敘事不僅呈現物質的功能和價值，更反映人物的精神，誠如高桂惠所言：「透過社交禮物這一媒介的流通，我們可以看見個體及集體的現象，裡面隱含的有物質性的內涵，也有精神性的內涵。」<sup>26</sup>本節討論的正是「巾帕」作為禮物所反映的精神性，這種精神性指的並非禮物交換的本質意義，而是禮物及其行為的意識或情感意味，由此探討巾帕塑造的形象。<sup>27</sup>

翟謙是西門慶在東京的人際關係的重要窗口，自然不可怠慢，某回，西門慶委託溫秀才寫了一封問安信：

<sup>26</sup> 高桂惠，〈《金瓶梅》「禮物」書寫初探〉，《金瓶梅國際學術研究討會論文集》（臺北：里仁出版社，2013），頁94。

<sup>27</sup> 何翠萍認為禮物交換的本質有五點，如「欲建立、維持或改善關係的表示」、「關係的品質需視禮物交換的方式和交換物的內容之質量而定」、「交換物的內容與交換方式，也是視彼此對既存關係的認識和期望而定」、「交換方式有直接和間接」、「人情債和以約定俗成交換物來確定某類的關係」，參氏著，〈禮物·人情·債——舊社會禮物交換型式〉，載自，法·牟斯著、何翠萍翻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臺北：允晨文化，1984），頁1-28。本文非從本質的角度，研究禮物的形式和功能，而是從探討禮物巾帕送出所代表的精神層面，探討禮物行為對塑造巾帕的意義。

寓清河養生西門慶，端肅書復大碩德柱國雲峰老親丈大人先生台下：自從京邸邂逅，數語之後，不覺違越光儀，條忽半載。生以不幸，閨人不祿，特蒙親家致賻儀，兼領誨教，足見為我之深且厚也。感刻無任，而終身不能忘矣。但恐一時官守責成，有所疎陋之處，企仰門墻，有負薦拔耳。又賴在老翁鈞前，當為錦覆，則生始終蒙恩之處，皆親家所賜也。今因便鴻，謹候起居，不勝馳戀，伏惟炤亮不宣。外具楊州縐紗汗巾十方，色綾汗巾十方，揀金挑牙二十付，烏金酒鍾十個，少將遠意，希笑納。（第六十七回，頁1071）

這份問安信是否恰當，涉及晚明的書信文化，須更多證據才可評斷，值得注意的是信件提及的禮物清單，有汗巾二十方。在同個場合中，汗巾再度現身，這次是在鄭月兒送來的禮盒：「是一方迴紋錦雙攔子細撮穗古碌錢同心方勝結、挑紅綾汗巾兒。」（第六十七回，頁1072）若西門慶贈送翟謙的汗巾是官方之間的應酬之舉，<sup>28</sup>鄭月兒贈與西門慶的汗巾就恐不單僅是應酬，而具有拉近彼此親密關係的意圖。<sup>29</sup>粗略來說，《金瓶梅》中巾帕作為禮物形象出現，主要反映三種精神性的表現：應酬、賞賜和親密。<sup>30</sup>

<sup>28</sup> 姚靈犀根據《識小錄》中的「禁書帕」所載，得出了：「明代官場以書籍手帕相關饋贈，後易金銀珠寶，仍曰書帕。今之書帕本，即明所遺。」《瓶外卮言—〈金瓶梅〉研究》（臺北：獨立作者，2013），頁217。在《金瓶梅》中雖然有書帕一詞，在敘事中卻仍然以汗巾直言，可見汗巾的形象意義。

<sup>29</sup> 後來鄭月兒也親口道出對兩樣事物的辛苦和心意：「愛月道：『揀他不難，只是要拿的著禁節兒便好。那日我胡亂整治了不多兒，知道爹好吃，教鄭春送來。那瓜仁都是我口裡一個個兒磕的，汗巾兒是我閑著用工夫撮的穗子。瓜仁子，說應花子倒過了好些吃了。』……」（第六十七回，頁1104）

<sup>30</sup> 楊美惠研究中國人際關係時，關係的藝術技巧最要旨的表現是在禮物收送：「在關係的藝術中，有三種東西可以用來交換，禮物、宴請和惠饋。」孫珉譯：《禮物、關係學和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109。從行為社會學的角度，全面分析《金瓶梅》的禮物清單及相關的敘事意義，相信可得新意，此處受限課題無法深究，僅單就巾帕的禮物行為，簡述其中的精神，藉此對照物質性敘事，解決巾帕的敘事及形象問題。

應酬是巾帕作為禮物常出現的精神性表現。應酬指的是，人物在某個節日或重要時機贈送對方的賀禮，賀禮可能作為生日禮物或節慶禮物，譬如第十七回的開頭：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那日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打選衣帽齊整，騎著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第十七回，頁227）

手帕或許做為壽禮可能稍嫌輕薄失禮，然而人物以手帕作為生日禮物的，不單是西門慶，吳銀兒拜李瓶兒為乾娘時準備的壽禮，手帕也在其中：「且說那日院中吳銀兒，先送了禮來，買了一盤壽桃、一盤壽麵、兩隻燒鴨、一副豕蹄、兩方綃金汗巾、一雙女鞋來，與李瓶兒上壽，就拜乾兒相交。」（第四十二回，頁618）經由兩例可知，對於《金瓶梅》的人物來說，巾帕確實可當壽禮。此種壽禮若就重複性表現來說，恰好凸顯應酬意味，畢竟粗略的說，禮物是基於人情世故所贈之物，其中的「禮」指的就是「禮節」、「禮儀」和「禮貌」之意思。不論送禮者是否有其確切心意，表面上都須執行送禮動作，此時贈送的禮物通常是依循常規（約定俗成）。換言之，送禮者選擇禮物的角度，通常不是私人的情誼和特殊的對象，而是按照一般慣例，巾帕此時顯然就是禮物的慣例，這便是為何當吳月娘問西門慶：「這出月初一日，是喬親家長姐生日，咱也還買分禮兒送了去。常言：先親后不改。莫非咱家孩兒沒了，斷了禮，不送了！」西門慶除了回說：「怎的不送？」吩咐來興所買的禮物清單中更須有汗巾。對重真切情意的人而言，應酬有負面涵義，因行動者並非有出自真心，而是基於社會約定或風俗習慣被迫為之。然而縱使贈送者是被迫，展現的應酬行動卻顯示人類活動的精神，若贈送者確實不在乎社會關係，便無須有應酬之舉，基此，縱使或許應酬形式的特徵使人感覺並非人物最為真心的行為，應酬之舉卻可說明人物須維繫、經營和他人間的情感關係之精神性。

禮物巾帕的第二種精神性是賞賜，賞賜行動一方面可釋為，送禮者的大方和無私或凸顯其身分和地位，另一方面也反映收禮者的感恩和辭

謝狀態及和送禮者的社會關係，是精神性的社會行動，巾帕的賞賜即是。賞賜和應酬的差異在前者無須留意送禮時機或環境，乃是隨著心情和情況自由給予，如吳月娘：「月娘與他一件雲絹比甲兒，汗巾、花翠之類，同李嬌兒送出到門首。」（第十二回，頁162）月娘贈送李桂姐汗巾之舉，可視作為展現家母的風範，強調其身為家母的地位，屬展現身分地位的行為，非純應酬之禮，送贈之舉也顯示其大方給予，即便背後隱含「報」的期望。<sup>31</sup>《金瓶梅》中吳月娘以家母或者西門慶以家主的身分進行的賞賜行為，可說屢見不鮮，譬如當宋巡按送禮，西門慶連忙吩咐著：「到家教書童快拿我的官衙雙摺手本回去。門子答賞他三兩銀子，兩方手帕，抬盒的每人與他五錢。」（第五十一回，頁772）如除夕夜：「王經、春鴻、玳安、平安、來安，棋童兒、琴童兒、畫童兒，來昭兒子鐵棍兒，來保兒子僧寶兒，來興女孩兒年兒來磕頭。西門慶與吳月娘，俱有手帕汗巾銀錢賞賜。」（第七十八回，頁1339）這些敘事充分顯示「汗巾」代表的是，在上者對於在下者的賞賜。從社會學角度，賞賜本身或許帶強烈的階級意識，屬於「單向的餽贈」行為，是人物展現該階級高度的儀式表現，而非同等階級的互惠行為，<sup>32</sup>只不過賞賜行為除了旨在展現了人物本身的階級高度外，同時顯現賞賜者對於被賞賜的照顧心意，自然屬於個體精神性的表現。

<sup>31</sup> 吳月娘和李瓶兒的大方可以做為對照，李瓶兒的大方通常不求回報，因讀者鮮少看到其基於某種需求而給予；吳月娘的大方顯得勉強，具有強烈的回報意圖，「報」的觀念恰好合乎其宗教信仰，即對於「因果報應」的深信不疑，從敘事的內容來看，吳月娘的禮物通常隱含回報的期望，不論是直接或間接的回應。

<sup>32</sup> 閻雲翔觀察中國村莊社會時發現，互惠原則不見得是實質上的交換經濟禮物，有時高階級者的會表現非強制性的單向餽贈，所謂的單向餽贈指的是高等階級者並不奢望或期待對方的物質上回贈之禮（社會權力和聲望或許才是其餽贈的動機），受餽者同樣無須回禮，而是欣然的接受，這種非均衡互惠狀態是禮物交換中的一個重要部分。請閻雲翔著、李放春等譯，《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頁148-154。

巾帕作為禮物的最後一個精神性是親密性。巾帕原即私密之物，文本開頭中提到潘金蓮交出汗巾作為信物，若信物是指愛情的見證物品，《金瓶梅》中巾帕確實有此形象表現（詳後文）。然而私密的巾帕所呈現的另一個形象乍看之下與情愛有關，即人物透過巾帕交換而獲得親密感，拉近或改變兩人的關係，實際上親密性和情愛性仍然有別。具體來說，親密性巾帕敘事是人物利用物品，拉近關係距離，關係距離卻尚未達到情愛的高度，尤其巾帕的親密性通常關乎著性交或者功利上的慾望，降低情愛的純粹意味。西門慶首見孟玉樓，所贈的禮物中有巾帕：「錦帕二方，寶釵一對，金戒指六個。」（第七回，頁92）禮物內容近似明代沈榜所記載的聘禮：「庶民家男女年命合婚，得吉即往相視，留一物示意，簪花、戒指、巾帕之類。」<sup>33</sup>暫且不論敘事是否合乎聘禮，從兩者相親的情境來推斷，禮物清單可能是基於社會風俗，不代表個人親密性。但當西門慶準備梳籠李桂姐時，取信動作是從「袖中取出汗巾，連挑牙和香茶盒兒，遞與桂姐收了」（第十一回，頁146）禮物汗巾明顯並非俗禮，還包含與對方更親密的精神性；期望在性關係上更進一步發展。或許論者會反駁上述的觀點，西門慶向女性贈出巾帕，皆非是基於親密性，如贈韓愛姐的「錦帕二方，金戒指四個，白銀二十兩」（第三十七回，頁542）。此禮的內容和西門慶打算疏籠李桂姐相似，也和贈與孟玉樓的禮物雷同，西門慶卻未和韓愛姐有性事。實際上，此敘事主要間接預告，韓愛姐之母王六兒將和西門慶發展親密性關係，其中的「他娘忙將戒指戴在女兒手上，朝上拜謝」，乃是意欲凸顯王六兒對禮物的反應，西門慶是由此找到偷情機會。再次重申，西門慶的這種親密性關係中所伴隨著性慾，自然降低了親密性的純粹精神意味，卻恰巧反映了笑笑生在部分巾帕敘事，試圖凸顯物質與精神的糾葛狀態，並且由此辯證與反映精神與物質間的拉鋸與誰為主導。

<sup>33</sup> 見明·沈榜，《宛署雜記》（臺北：新興出版社，1983）中的「婚禮條」。陳寶良承此說法：「在北京，大體為先選吉日，前去相親，留下簪花、戒指、巾帕之類，表示婚姻之意。」《明代社會生活史》，頁428。

總體來說，女性人物頗留意巾帕的親密性，有回鄭愛月兒鬧著西門慶索香茶，從他身上搜出汗巾，其一「紫縐紗汗巾兒，上栓著一副揀金挑牙兒」。鄭愛月兒拿在手中觀看，說：「我見桂姐和吳銀兒都拿著這樣汗巾兒，原來是你與他的？」西門慶回：「是我揚州船上帶來的，不是我與他，誰與他的？你若愛，與了你罷。到明日再送一副與你姐姐。」（第五十九回，頁919）此敘事除了展現妓女如何向恩客索求禮物的技巧和慾望，另一方面道出人物感受贈送巾帕的親密性。須留意的是，笑笑生敘述「汗巾收入袖中」之舉是向讀者傳達，西門慶懂得鄭愛月兒意欲親密意圖。葛霖認為：「與公共日用品不同，手帕作為一種個人飾物，僅為個人的專屬之物，人們不能共用一塊手帕，更不能輕易地轉借給他人，這就決定了它私密性的特點。同時手帕蘊含著個人的獨特心思，是個人內在情感的載體。這就決定了手帕可以代表個體表明心跡，傳達情感愛意，在傳遞情感資訊過程中發揮自己獨特的作用。」<sup>34</sup>不論《金瓶梅》中人物贈送巾帕，是否有任何愛意，至少對於雙方來說，某些巾帕的贈送和親密性是有直接關連，巾帕此時呈現的是一種雙方互通心意的精神性。

## （二）以巾帕傳情

從人類活動來看，人們早懂得利用外在物品表達內在精神及情感，除了常見的禮物形式外，另一個重要的形式類型是信物。信物顧名思義，指的是雙方為了取信對方或作為驗證承諾的物品，通用範圍不受限男女關係，兄弟、父母或兩個陌生人皆可。在傳統的中國古典敘事文學中，信物多數成為男女情感關係的重要表徵，信物此時偏向意指男女情愛的約定，多過其他關係的約束義。<sup>35</sup>譬如明末清初的話本小說中，信

<sup>34</sup> 參葛霖，《論狄更斯長篇小說中手帕的功能》，頁13。

<sup>35</sup> 張丑平：「魏晉六朝之後，隨著小說這種敘事文學的發展，信物成了小說家青睞的物件，小說中的信物不僅是男女主人公表達愛慕、私定終身的物件，也是故事情節得以展開的重要線索以及作者刻畫人物的重要手段。」

物擔任重要的功能性物象，〈蔣興哥重會珍珠衫〉是其中的經典之作，珍珠衫一方面是貫穿整個故事線索的關鍵事物，另一方面也是愛情轉移的重要佐證。

某方面來說，笑笑生也明白以物傳情或表情的敘事傳統，巾帕成為表現人物精神或情感的重要物品。《金瓶梅》中能充分顯現人物以巾帕傳情的表現，不僅是在巾帕的贈出，還包括贈出的巾帕為舊有：

經濟笑道：『五娘，你拿你袖的那方汗巾兒賞與兒子，兒子與了你的鞋罷。』婦人道：『我明日另尋一方好汗巾兒。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經濟道：『我不，別的就與我一千方也不算，一心我只要你老人家這方汗巾兒。』婦人笑道：『好個牢成久慣的短命！我也沒氣力和你兩個纏。』於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細撮穗、白綾挑線鶯鶯繞夜香汗巾兒，上面連銀三事兒，都掠與他。（第二十八回，頁401）

田曉菲對此評論：「試對比第四回中，王婆硬逼著金蓮把袖子裡面的汗巾子送給西門慶做定情物、金蓮百般不肯的一幕，金蓮的變化可謂觸目驚心。」<sup>36</sup>從人物形象的變化來說，潘金蓮的表現確實誠如田曉菲所言。若從巾帕代表信物的敘事來看，笑笑生旨在凸顯在人物的心中，新舊手帕顯然有著不同的意義。具體來說，潘金蓮和陳經濟兩人此處所商議或爭論的，不在巾帕的贈出與否，而是所贈巾帕應為新或舊的問題？從信物象徵性角度觀之，只要對方是誠心真意的贈出巾帕，雙方都願將巾帕視為情意的代表，巾帕究竟是新或舊都應非關鍵。陳經濟卻纏著潘金蓮索求舊巾帕，加上潘金蓮起初的拒絕表現，一個極可能的原因，人物認為舊巾帕相較新巾帕更有對方分身之意味。或許，貼身物品的氣味和其它乾淨巾帕自然有所不同，陳經濟的意圖可能是憑藉巾帕氣味，意淫潘金蓮，屬於慾望上的物質表現。然而，正因舊巾帕散發的氣味，使得巾

〈古代小說中愛情信物的文化內蘊與敘事意義〉，《學術界》174期（2012），頁176。

<sup>36</sup> 美·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頁89。



帕更適合成為對方分身，具備睹物思人的功能，精神性更加濃烈。<sup>37</sup>若承此，潘金蓮最終妥協，願意交出舊巾帕的舉止，可說有精神性意義，充分反映暗中款曲的念頭。

無獨有偶，《紅樓夢》中同樣出現人物憑藉新舊巾帕的贈出行動，感受對方精神或情感的敘事<sup>38</sup>：

寶玉想了想，便伸手拿了兩條舊絹子，撂與晴雯，笑道：「也罷，就說我叫你送這個給他去了。」晴雯道：「這又奇了，他要這半新不舊的兩條絹子？他又要惱了，說你打趣他。」寶玉笑道：「你放心，他自然知道。」晴雯聽了，只得拿了絹子，往瀟湘館來。只見春纖正在欄杆上晾手中，見他進來，忙搖手兒說：「睡下了。」晴雯走進來，滿屋漆黑，並未點燈，黛玉已睡在床上，問：「是誰？」晴雯答道：「晴雯。」黛玉道：「做什麼？」晴雯道：「二爺叫給姑娘送絹子來了。」黛玉聽了，心中發悶，暗想：「做什麼送絹子來給我？」因問：「這絹子是誰送他的？必定是好的，叫他留著送別人罷，我這會子不用這個。」晴雯笑道：「不是新

<sup>37</sup> 馮夢龍編輯的《掛枝兒》也收錄汗巾歌詞：「這兩日，鬆了你。你就有些作怪。衣袖裡灑出條汗巾來。小字兒現寫著，你還要賴。快快的說與我，莫討我做出來。就扯做箇條兒也，這冤仇還未解。汗巾兒，汗巾兒，誰人扯破？快快說，快快說，不要瞞我。若還不說就有天大的禍，汗巾兒人事小，汗巾兒人意多。作賤我的汗巾也，如同作賤我。」《馮夢龍全集·掛枝兒·扯汗巾》（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 62。馮夢龍對此評語：「每見青樓中凡受人私餉，皆以為固然，或酷用，或轉贈，若不甚惜。至自己偶以一扇一幌贈人，故作珍祕，歲月之餘，猶詢存否。而痴兒亦遂珍之祕之，什襲藏之。甚則人已去而物存，猶戀戀似有餘香者，真可笑已。余少時從狎邪遊，得所轉贈詩幌甚多。夫贈詩以幌，本冀留諸篋中，永以為好也。而豈意其旋作長條贈人乎？然則汗巾套子耳，雖扯破可矣。」評語中，馮夢龍道出了以「幌」念「人」的意義，其情感意義頗重，尤其物中殘有餘香。另一方面，馮夢龍也指出多數人不懂欣賞禮幌之情，當然也包括幌中之詩。這種感慨和所引的歌謠實際上有別，因歌謠中的汗巾包括馮夢龍所重視的情意，扯破動作並不是無謂撕毀，而是表達一種絕望的精神宣示。

<sup>38</sup> 《紅樓夢》是否深受《金瓶梅》的影響學界有不同意見，胡衍南認為《金瓶梅》對《紅樓夢》的影響性，缺乏更多直接證據，參〈《紅樓夢》於《金瓶梅》之影響研究〉，載《中國學術年刊》第 28 期（2006），頁 161-184。

的，就是家常舊的。」黛玉聽了，越發悶住了。細心揣度，一時方大悟過來，連忙說：「放下，去罷。」晴雯只得放下，抽身回去。一路盤算，不解何意。這黛玉體貼出絹子的意思來，不覺痴心醉，想到：「寶玉能領會我這一番苦意，又令我可喜。我這一番苦意，不知將來可能如意不能，又令我可悲。要不是這個意思，忽然好好的送兩塊帕子來，竟又令我可笑了。」再想到私相傳遞，又覺可懼。<sup>39</sup>（第三十四回）

晴雯的反應代表一般讀者不解舊絹的意義，黛玉究竟領悟什麼，寶玉又企圖傳遞什麼。<sup>40</sup>不解中的了解正是曹雪芹的敘述目的，情感之不可言喻，其中舊帕帶來的情感關係不在實用性或價格性功能，而是貼身或分身的精神性。黛玉起初不願接受寶玉之帕，乃是誤會對方送來的是新帕，新帕僅是一般性禮物，後來聽聞是舊巾帕，想法便不同，立即同意收下，轉變的關鍵在對黛玉來說，「舊」的意義大於「新」。<sup>41</sup>從創作的思維來看，曹雪芹和笑笑生顯然皆都明白，舊巾帕具有的表情意味，故有類近敘事。

<sup>39</sup> 清·曹雪芹，《紅樓夢》（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4），頁460。以「半新不舊」一詞凸顯情感面的用法也出現馮夢龍的〈查問〉：「曾送你玉簪兒，戴也不戴？曾送你青絲帶，可曾繫來？曾送你汗巾兒，在也不在？曾送你一把銷金扇，曾送你一隻半新不舊的紅睡鞋。這幾件要緊的東西也，如何問著你佯不睬？」《馮夢龍全集·掛枝兒》，頁50。馮夢龍在詞後寫下評點：「『半新不舊』，『不』字佳。舊云『半新半舊』，便無味了。這幾件東西，都沒要緊，要緊的不在這幾件東西。」同書，頁51。「緊的不在這幾件東西」道出了事物隱含的精神性。

<sup>40</sup> 劉相雨認為寶玉送出兩條舊手帕，使得黛玉想起情愛過往，具回憶和見證之效。參氏著，〈因枝振葉，沿波討源——談《紅樓夢》中的手帕〉，《紅樓夢學刊》2014年第3期，頁264。

<sup>41</sup> 郭孔生認為：「在《紅樓夢》這部小說中，寶玉給黛玉送舊手帕只是一個連脂評都不曾關注的細節，寶玉送舊手帕這個舉動，在旁人看來好像是漫不經心的，其實舊手帕中所蘊涵的意義非常深，甚至被姚燮認為是《紅樓夢》『大交關處』，這兩塊作為寶黛定情信物的舊手帕，含蓄而又深刻地傳遞著寶黛之間的無限牽掛與纏綿，這種耐人尋味的表現方式，與中國古典美學含蓄內斂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紅樓夢》手帕意象的解讀〉，《語文建設》第29期（2014），頁31。

巾帕的精神性也來自於巾帕中的情詩。前述，潘金蓮在西門慶迎娶孟玉樓時，請玳安送花箋，此箋中所寫的寄生草，詞中有「你今果是負了奴心，不來，還我香羅帕」（第八回，頁104-105）。此仿閨怨詞的句子充分顯露潘金蓮對西門慶的情意。倘若這段敘事中，笑笑生尚未聯想到或運用巾帕和情詩的關係，僅是以詞表情，那麼西門慶死後，潘金蓮對於陳經濟的示愛中，巾帕和情詩的關聯則獲得進一步的開展：

一日四月天氣，潘金蓮將自己袖的一方銀絲汗巾兒，裹著一個玉色紗挑線香袋兒，裡面裝安息香、排草、玫瑰花瓣兒，并一縷頭髮，又著些松栢兒，一面挑著「松栢長青」，一面是「人如花面」八字，封的停當，要與經濟。不想經濟不在廂房內，遂打窗眼內投進去。後經濟開門，進入房中，看見彌封甚厚，打開都是汗巾香袋兒。紙上寫一詞，名寄生草：「將奴這銀絲帕，并香囊寄與他。當中結下青絲髮，松栢兒要你常牽掛，淚珠兒滴寫相思話。夜深燈照的奴影兒孤，休負了夜深潛等茶糜架。」（第八十二回，頁1423-1424。

中國古典文學史上在物品上書寫情詩以記錄或表達情感的歷史悠久，巾帕上題詩的表現便是唐代小說中既有的敘事<sup>42</sup>，由此角度，笑笑生是繼承這項既有傳統，不算新穎敘事筆法。此處並非意圖抬高笑笑生將巾帕情詩的創意（笑笑生的創意在將巾帕情詩的精神性帶入了物質性內容，詳見後文），而是強調《金瓶梅》中，巾帕的另一個敘事功能在表情，此時巾帕呈現的形象是精神性。或可仔細留意，笑笑生在此讓潘金蓮送出了多種物品：頭髮、花瓣、香袋，這些是傳統文學表情或傳情時的重要物品，若再加上其中清楚思念的情詩，更見濃烈的情意，而其中的汗巾自然也是載情的物品，具有精神性。

潘金蓮對於陳經濟在情愛上的影響，不僅是在性愛經驗方面，表情上也留下了明顯足跡：「愛姐看了，見帕上寫著四句詩曰：『吳綾帕兒

<sup>42</sup> 誠如張俊所言：「以手帕作為愛情信物，乃舊時習見風俗。唐代元稹《鶯鶯傳》，即寫張生與鶯鶯以手帕題詩相贈，表達愛意。」張俊等著，《新批校注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第626頁。

織迴紋，洒翰揮毫墨跡新；寄與多情韓五姐，永諧鸞鳳百年情。」看畢，愛姐把銀子付與王六兒。」（第九十八回，頁1664）愛姐所收的巾帕和帕中情詩皆源自陳經濟，是陳經濟表達對韓愛姐情意的方式，這個手段其實是從潘金蓮身上偷師。該條巾帕和情詩再次現身時，陳經濟已身亡，巾帕和詩歌此時是韓愛姐向龐春梅、葛翠屏，證明自己和陳經濟的情感之物。張寶月認為：「以愛情為題材的小說，多以才子佳人為主角，因此也自然免不了吟詩作詞，玩賞風雅。男女主角在詩詞唱和之中傾吐心中的情思，剖白彼此的心跡，詩詞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締結良緣的證物。這類信物雖不似珍寶那樣稀有難得，卻蘊涵了男女主人公的才思和感情，表明男女之間的求偶標準已經超越了容貌、財富等外在因素，而上升到才情思想等內在精神的層面，同時也為兩人之間的愛情增添了風雅而浪漫的色彩。」<sup>43</sup>承此，一方面讀者或可將《金瓶梅》巾帕中附有詩詞的敘事表現，視為笑笑生對才子佳人小說模式的諧擬或反諷，另一方面，卻不應忽略情詩的存在和內容確實也使巾帕達到傳情或表情的精神性形象。<sup>44</sup>

嚴格來說，多數明清小說中的巾帕作為信物，通常是道具式，巾帕偏向為了推動情節而敘，即藉由巾帕串連故事的前後發展，誠如馮夢龍小說中：「張蓋袖中摸出一條紅綾汗巾，結個同新方勝，團做一塊，望下擲來。那女子雙手來接，恰好正中，就月底下仔細看了一看，把來袖過。就脫下一隻鞋兒投下。張蓋雙手承受，看時是一隻合色鞋兒，將指頭量摸，剛剛一拆。把來繫在汗巾頭上，納在袖裡。」<sup>45</sup>此寫法乍看之下，和王婆命令西門慶與潘金蓮交換汗巾與簪子的方式相似，但仔細分

<sup>43</sup> 張寶月，〈「三言」中定情信物的功能〉，《青年文學家》2010年第1期，頁14。

<sup>44</sup> 林黛玉也曾在巾帕上寫下詩歌，巾帕詩歌縱使展現情意，主要的卻是人物的自我對話，情詩並未送到寶玉手中，也因此與潘金蓮或陳經濟的以巾帕傳情的方式有別。

<sup>45</sup> 馮夢龍，《陸五漢硬留合色鞋·馮夢龍全集·醒世恆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頁303。

析物品交換的時間點和條件其實不相同，使得兩者的意義和形象有所差距。具體來說，後者是發生性關係而交換，前者僅是為了能進一步相見的私約信物，倘若再加上另一個信物「合色鞋」明顯就是為了推演故事的情節道具，尤其鞋子不僅是拆散兩人，情意也從未滋長，由此可見很難說汗巾和鞋子有何等深切的情意。此現象如萬明田在研究古典戲曲的信物時所提及，某些道具並不等於信物，信物可暗示情感的存在卻無法充分傳達雙方情意。<sup>46</sup>再如，凌濛初的〈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小說出現了兩信物：竹箭、羊脂玉鬧妝。從情節發展和人物表現來說，兩信物也鮮少有情意的成分，而僅是迎合天機或時運的道具。上述道具式信物皆是作為情節推動所用，間接地暗示人物的情感或態度。總言之，某些小說家或視物品為情節道具，此時物品雖非可以隨意替換，但對人物來說，這項物品並非具有某種特殊情感意義，由此角度來說，物品的存在鮮少有助於形塑人物的情感表現，而是讓情節合理的發展；與此不同，有些小說家筆下物品的情節性雖然偏低，物品的敘述旨在凸顯人物的行為反應及情感程度，物品便可鮮明彰顯人物對他人的精神性與情感性。大體來說笑笑生在《金瓶梅》中的敘事是偏向後者，讀者雖見巾帕的情節意義，巾帕卻並非帶領情節發展的主要動力，巾帕的敘事在形塑人物運用巾帕的行動和表現，如此巾帕便可以反映人物情意的精神性形象。

綜合上述，笑笑生以信物敘事的方式呈現了巾帕的精神性形象。然而下節中本文將深入探討，笑笑生雖然讓巾帕作為信物，展現一定程度的精神性的形象與意義，卻又在之後的情節和敘事中，推翻或顛覆了巾帕的精神性形象，這裡所指的不僅是將巾帕轉交給他人的動作，取消了愛情的堅貞意涵，另一方面更指其他敘事中，巾帕夾雜著實用或價格或性交等等物質性面向，使得巾帕難以保持純粹的精神性形象。

<sup>46</sup> 萬明田，《中國古典戲曲中的定情信物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0），頁5。

#### 四、以物為主的世界觀：巾帕敘事中物質與精神的關係

誠如前述，巾帕擔任禮物和信物時所呈現的是精神性形象，讀者卻又很難將巾帕視為純粹精神性的禮物或信物，是因巾帕所帶來的物質欲望：

西門慶這裡隨即封了兩方手帕、五錢白金，差琴童送軸子并毡衫皮箱到尚舉人處收下。（第七十七回，頁1313）

止有元宵兒在屋裡，經濟梯已與了他一方手帕，安付他著守房中：「我往你五娘那邊，請我下棋去。等大姑娘進來，你快叫我去。」……（第八十二回，頁1424）

西門慶給予宋舉人的手帕，是為了感謝對方幫忙求來兩幅軸文；陳經濟為求能和金蓮見面，而以巾帕行賄元宵兒，兩處巾帕皆非單純的精神性，反倒展現強烈地功利性或賄賂性的物欲。此處的物欲不僅是指收禮者對於物質巾帕的慾望，亦指贈出者憑藉巾帕達成何種目標的慾望。不僅上述兩例，吳銀兒在李瓶兒的壽辰，送來的「壽禮」巾帕更是人物物欲的經典，表面上此巾帕是符合社會制約的精神之禮，骨子裡卻是妓女拉攏關係的招數，欲建立「擬血親關係」，「就拜乾兒相交」才是吳銀兒送巾帕的真正目的。具體來說，吳銀兒拜李瓶兒為母，並非精神上的情感友好，而是為了從對方身上獲得好處，李瓶兒願同意有多原因，一可推測的是意欲藉此此事，更加確立自身在西門家的母親地位。簡言之，敘事看似在反映人物精神，其實都流露物質性的欲望。當然人物欲望是否也可視為精神性表現，有待辯論，起碼欲望本身就帶有物質性的色彩，因此以慾望為目的的巾帕敘事便很難說是純粹的精神性形象。<sup>47</sup>

<sup>47</sup> 美·黃衛總著、張蘊爽譯：「《金瓶梅》正視的是私人欲望的深層內涵和後果以及人們是如何被這些欲望所驅使和吞噬的眾生相。在其之前，沒有一部中國長篇小說將作為人的心理現象的欲望描繪得如此具有「物質性」。」《中華帝國晚期的欲望和小說敘述》，頁81。本文深受此論文的啟發，尤

其它明代小說中部分人物也展現追求物質的欲望和行動，如文若虛，<sup>48</sup>這些人物的精神主體卻有別於《金瓶梅》的多數人物，因為人物追求物質只是敘事的表象，實質上人物的人生目標和行為操守仍然遵守傳統社會的道德和倫理，追求物質的手段必須正當坦蕩，尤其追求物質通常是為了成就公眾利益或家庭事業，而非滿足個人私慾，這類敘事中，精神是凌駕物質之上，人物是不役於物質的。換言之，人物的精神和表現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向物質靠攏，但當人物完成或獲得物質後，精神不但不限於物質，甚至反倒利用物質，圓滿或充實更具崇高精神性的道德倫理或情感的領域，這便是將物質注入精神中，而非精神受限物質。與此有別，前述所論及的《金瓶梅》巾帕敘事，不少人物的動機和手段顯然有違傳統道德準則，以巾帕作為禮物的敘事為例，禮物並非僅僅代表純粹心意，人物展現的物質性欲望是，期望透過這份禮物，好為自己帶來更大的報酬，這是精神受限物質和慾望的表現。

另一個和巾帕作為禮物所展現的賄賂性或功利性的欲望相似，是在巾帕作為信物的敘事中，讀者可從贈送過程感受男女性欲成分：

玳安道：「賁四娘子，從他女孩兒嫁了，沒人使。常央及小的每替他買買甚麼兒。」西門慶道：「他既沒人使，你每替他勤勤兒也罷。」又悄悄向玳安道：「你慢慢和他說，如此這般：『爹要來你這屋裡來看你看兒，你心如何？』看他怎麼的說。他若肯了，你問他討個汗巾兒來與我。」玳安道：「小的知道了。」……（第七十七回，頁1327）

至第七十七回，笑笑生已經將建構了不少巾帕的相關敘事，巾帕儼然成為男女偷情或性愛的證據。西門慶交代玳安，賁四嫂若同意的回應方式

---

其此文對欲望物質性的提出和分析，然而文中黃衛總將欲望的另一面稱「非物質性」，並與傳統的氣觀相連，該分法確實較有歷史性和圓融，缺點是難以和物質性的對立面有所應答，故本文將欲望的另一部分稱精神性，捨棄非物質性的用法，以凸顯物質性和精神性的對立與複雜關係。

<sup>48</sup> 明·凌濛初，〈轉運漢巧遇洞庭紅 波斯胡指破鼉龍殼〉，《拍案驚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社，1992），頁1-15。

是「汗巾」，可視為這類敘事的一部分。巾帕不論作為性交後的承諾或性交前的同意，所擔任的重要功能就是信物，是為取信對方所用。

一般才子佳人小說中，敘事通常和性慾無關，有別於豔情小說，「書中很少有淫穢的情節描寫，少數作品僅在合巹夜用『雲雨』、『陽台』之類的詞語作了含蓄的形容，一筆帶過」<sup>49</sup>，造成這個現象的原因之一誠如李志宏所言：「從文化學的角度進行分析，才子佳人小說在社會消費文化中起主導作用的關鍵因素，其原因即在於以『情』為敘事建構主體的社會文化價值表現」與「今觀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品皆以『情』作為主題內容的基本創作理念，一方面表現『情始於男女』的『真情觀』，一方面展現『情深不移』的『定情觀』，一方面又強調『情禮合一』的『名教觀』。」<sup>50</sup>實際上情並非必然與性矛盾或衝突，情與性的靈肉結合也可能成為小說家追求的理想價值，然而，多數才子佳人小說的世界中，兩者難以融合，甚至性成為考驗「情」的存在。承此，才子佳人小說的信物若是擔任傳情的敘事功能，通常需要迴避性慾的成分。此處迴避性慾指的不僅在於，該項信物不應是性方面的助興物品，信物的相關敘事也不應帶有過分的性暗示或性行為。<sup>51</sup>譬如《情夢析》中的主人公胡楚卿為報答衾姐恩情贈出的桃紅汗巾和紫金通氣簪，或若素交換的「藍寶石小魚」與「水晶塊」，這些物品一方面是形塑人物的情意，另一方面擔任人物之間相遇緣分的情節功能性物

<sup>49</sup> 雙迪國際出版社編輯部，《飛花艷想·飛花艷想序言》（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4），頁36。

<sup>50</sup> 李志宏，《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敘事研究》（臺北：大安出版社，2008），頁32、頁111。此書中李志宏還從「人情一寫實」小說的發展細分為「豔情小說」（淫）、「才子佳人小說」（情）、「家庭小說」（婚姻）三類，關於三類在信物敘事的差異須另闢專文，此處藉由三者的分類點出「才子佳人小說」信物敘事上的特點和傾向。

<sup>51</sup> 才子佳人小說迴避性描寫是基於讀者考量或者反映儒家的性慾觀或其他原因，是一個有趣的課題，課題實際上也涉及到愛情的觀念；此外，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在性敘事上的差異性，則是另一個待關的專題。本文無法回答上述兩大課題，僅是點出多數才子佳人小說避免性敘事和慾望、物質與精神的特質。



品，幾乎不見性欲成分。<sup>52</sup>即便是才子佳人小說與艷情小說的混合之作《五鳳吟》中的信物「金鳳釵」，也難以視為性慾前後的相關物品，而是「以金鳳釵為道具，貫穿始終，以鄒雪娥遺釵，祝琪生拾釵始，以一男五女合歡酬釵終」的敘事功能，更別說，小說人物最終甚將這隻緣分釵，視為聖物虔誠地供奉，「金鳳釵是你我撮合老人，不可褻他」。<sup>53</sup>

《金瓶梅》中西門慶和女性互動的中帕，卻明顯地帶有性欲軌跡和關聯性。除了西門慶和婦人、妓女們的贈送巾帕行為，幾乎都是為了性欲的滿足外，巾帕更是男女之間偷情關係的見證物，「惠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之後，背地不算與他衣服、汗巾、首飾、香茶之類……」（第二十二回，頁313）、「自此以後，常在門首成兩價拿銀錢買剪截花翠汗巾之類……」（第二十二回，頁331）汗巾此時代表人物私下的性交易，連下人來旺兒都懂得，送私通的孫雪娥「兩方綾汗巾」（第二十五回，頁348）。若讀者同意汗巾為男女偷情的見證物，或可重省潘金蓮委託陳經濟購買汗巾的主要動機，或許潘金蓮要「巾」是藉口，要「精」才是實情。<sup>54</sup>若加上笑笑生敘述西門慶收到對方汗巾的舉動，巾帕敘事以信物為物質欲望的反映和投射形象相信就更清楚：「聞了聞，噴鼻香。滿心歡喜，連忙袖了。」（第七十七回，頁1328）這項動作就本文課題更是合乎物質欲望，聞香是為了滿足暫時性的性欲，最終目標是能夠與巾帕的主人交歡一番。巾帕的性欲意味，正是在此充分彰顯。是此，一般才子佳人小說中，原應排除性和欲的信物敘事，《金瓶梅》中卻不斷

<sup>52</sup> 清·惠水安陽酒民，《情夢析》（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6）。

<sup>53</sup> 清·雲間嗤道人，《五鳳吟》（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6），頁37、頁269。

<sup>54</sup> 即是「那金蓮扭回粉頸，科睨秋波，對著陳經濟笑罵道：「你這少死的賊短命！誰要你撲？將人來聽見，敢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怕死了，搗了幾鍾酒兒，在這裡來鬼混！」因問：「你買的汗巾兒，怎了？」那經濟笑嘻嘻，向袖子中取出，一手遞與他。說道：「六娘的都在這裡了。」又道：「汗巾兒稍了來，你把甚來謝我？」于是把臉子挨向他身邊。被金蓮只一推。」（第五十二回，頁797）這段巾帕敘事充滿性慾色彩，潘金蓮和陳經濟兩人顯然準備利用購買巾帕所帶來的時機，偷情雲雨。

和物質欲望有所牽扯，使得信物的精神性染上了物質性彩色，當欲望主導，倫理或其他情感退居其次，物質性便勝於精神性，成為人物存在的主要核心。

倘若上述敘事不足以說明，人物的精神性是從屬於物質性，那麼部分巾帕中的情詩相信可顯示，物質性的力量是如何超越精神性：

婦人教春梅陪著薛嫂吃酒，他進入房。半晌，拿了一方白綾帕，一個金戒子兒，帕兒上也寫著一詞在上，說道：「我為你耽驚受怕，我為你折挫渾家，我為你脂粉不曾搽，我為你在人前拋了些見識，我為你奴婢上使了些銀錢；咱兩個一雙憔悴殺！」……（第八十五回，頁1467）

雖然前述笑笑生賦予巾帕精神性的敘事，同此，潘金蓮在巾帕上寫下情詞，訴說情意是潘金蓮的習慣，可以視為人物浪漫精神的表現；然而仔細推敲，所謂受怕、折挫、拋了見識、憔悴都不是純然精神上的過度相思所致，而是慾求不滿。此話不是否定潘金蓮詞中具有精神性的涵義，而是若從敘事呈現的關聯性來看，讀者將發現此回中，潘金蓮的相思哀愁或起因於無法繼續和陳經濟私會，兩人私會的結果和目的其實是為了完成性交活動，就此來看，愁緒的主因是性欲，而非單純的相思，前者帶慾望性，後者屬精神性。正因此，即使巾帕上的詞沒有半點性慾，而是各種傷心，猶如閨怨詞的再現，讀者也理應想起潘金蓮的相思和哀愁的原因，主要是源自性慾的不滿，尤其當兩人見面之後就急著性交，情詩成了求歡詩歌。「寄生草」一詞也有類似意圖，經濟收到潘金蓮此詞，明白是許他「私會佳期」，還回了一把「湘妃竹白紗扇兒」，扇上附有一首「水仙子」：「紫竹白紗甚逍遙，綠□青蒲巧製成，金鉸銀錢十分妙。妙人兒堪用著，遮炎天少把風招。有人處常常袖著，無人處慢慢輕搖。休教那俗人見偷了！」（第八十二回，頁1424）詞中的勸戒的「見偷」兩字，指的恐怕不僅是表面上白紗扇的丟棄，背後的意義乃是提醒潘金蓮別輕易勾搭他人（偷人），在這樣的敘事下，本詩情畫意的相贈情詞，皆因兩人的性慾和性行為有所沖淡和變奏，畢竟巾帕中的情詩本

來是為表達兩人的情意，笑笑生卻讓人物後續有關行為反轉了巾帕詩詞中情意的印象或者成分，換句話說，縱使敘事中巾帕的情詩仍然具有表情和傳情的功能，巾帕形象卻難以停留在純粹的精神性，反倒令人深度懷疑愁苦的情詩，是否僅為達成性交，滿足性欲所使。

笑笑生以巾帕作為性行為的信物或利用情節以顛覆情詞上的情意，不應視為否定精神性的存在，而是凸顯物質性作為一種世界的構成主力，人物的精神也是受其制約。高桂惠認為：「（陳經濟）他在這場交換和贈予當中，以窺探私密情慾活動的證物，換得潘金蓮貼身的汗巾，這貼身汗巾浸染玉體淋漓香汗的情慾想像，其實與繡履不分軒輊。也由於這汗巾非同小可，所以潘金蓮承受了很大的風險，『這汗巾兒；是你爹成日眼裡見過，不好與你的。』但她畢竟給了陳經濟，間接表達了同意兩人的風月情懷更進一步的意願，基於此，這汗巾也有信物的意義。而『信物』代表一種默認的人際關係契約，見此物如見人，見物而憶當時之境，兩人經此之後，只要找到機會就偷情……」<sup>55</sup>不論是作為情慾想像、人際關係的契約等，顯然巾帕代表的是人物的慾望性，這個慾望性雖帶有精神的意味，更多的是意味物質的影響和表現。至此，我們可回到本文的開頭引文：

婆子道：「你們兩人，出語無憑，當各人留下件表記物件拿著，纔見真情。」西門慶便向頭上拔下一根金頭銀簪，又來插在婦人雲髻上。婦人除下來袖了，恐怕到家，武大看見生疑。一面亦將袖中巾帕，遞與西門慶收了。（第四回，頁55。）

此處巾帕一方面代表的信約和情意及其象徵的意義，另一方面卻是性行為的證據和延續，笑笑生對巾帕的敘事在此時就已定調，故而後讀者屢見男女的私情或者情愛，經常表以贈送巾帕的舉動，卻又染上了不少物質的慾望。換句話說，男女傳達情誼的巾帕在笑笑生筆下，成了帶有物

<sup>55</sup> 高桂惠，〈《金瓶梅》「禮物」書寫初探〉，《金瓶梅國際學術研究討論會論文集》（臺北：里仁出版社，2013），頁116。

質色彩的諷刺工具，因為男女互贈的信物，多數並非為了精神上的延續和緬懷，而是性慾的滿足和遺留。

若小說人物是現實人物的反照，人物自然也有其物質性與精神性。若狹義的精神性指的是道德倫理或情感等抽象概念的實踐和完成，廣義的精神性偏向指揮人物的行動和表現的意念來說，那麼小說人物在狹義精神性或廣義精神性，各有程度上的差異存在，研究人物狹義或廣義精神性表現有眾多的切入點，其中一個較容易發現和運用的是，從精神和物質的對立概念，分析人物對外在物質事物的反應和回應。具體來說，研究者透過人物對於某事物的使用方法、態度和目標，相信可以從中發現和思考人物精神性（不論狹義或廣義）和物質性的關係。承此，若《金瓶梅》的人物使用巾帕的情形可視為廣義精神性的表現，其中實際上包含物質性和狹義精神性的實踐，而從上述分析來看，總體來說人物的精神性是從屬物質，物質指的不僅是巾帕本身的物質成分和實用作用，還包括巾帕中的精神性被人物自我取消，呈現以物質和欲望為導向，尤其倫理或道德等狹義精神性並非其行動的準則或目標。從本文巾帕敘事研究來看，笑笑生雖然認為人物活在物質世界，並擁有使用的決定權，最後卻受限物質力量，即便人物似乎展現使用物品的表現，卻因目標和方式，物質實質上成為主導人物精神的力量，這是小說人物尚無自覺之處，也是《金瓶梅》意欲凸顯的事實。從本文的角度來說，笑笑生在巾帕敘事中意欲彰顯的，正是精神臣服於物質的事實，道出一個「以物為主」的世界觀。

## 五、結論

西門慶死前，吳月娘忙要琴童請吳神仙來，笑笑生如此敘述其模樣：「不似往時，形容消減，病體慙慙，勒著手帕，在於臥榻。」（第七十九回，頁1387）從字面上來看，勒著手帕可以釋為，西門慶握著手

帕的動作，然而，或也可釋為西門慶終究被手帕（性交和物質）勒死。承前述，這恰巧說明人物精神無法對抗物質的結果，具有象徵性的意義。

在中帕敘事中，笑笑生讓讀者清楚見到物品對人物影響面，有別物品在百科全書的類書中，僅是單一的知識性和說明性的介紹。<sup>56</sup>物品對類書的編撰者來說，僅是一個絕對客觀的存在，對於笑笑生來說，物品是影響和決定人物生活樣貌的事物。寧宗一言：「笑笑生之所以偉大，正在於他根本沒有用通用的目光、通用的感覺感知生活。《金瓶梅》的藝術世界之所以別具一格，就在於笑笑生為自己找到了一個不同於一般的審視生活和反思生活以及呈現生活的視點和敘事方式。」<sup>57</sup>從本文對中帕敘事研究來看，寧宗一所言，笑笑生找到呈現生活的視點和敘事方式在「物質」範疇。或許某些研究者認為，此結論似乎否定了笑笑生繼承文學傳統的部分，確實隱喻或象徵的修辭傳統會影響文學家的表現，即傳統文學修辭會規範文學家的修辭表現，只是所謂的規範不代表沒有突破的空間和敘事，這種強烈限制下的有限表現，不僅說明了文學家的獨特性，更為重要的是觀念上突破的意義。換言之文學事物的象徵意義雖然隨著時代語境有所改變，群體修辭意象也通常是凌駕個人修辭意象，即使如此，偉大文學家仍在有限條件下，參與文化群體意象的創作並有所突破發展。

《金瓶梅》的中帕敘事自然留有傳統敘事的痕跡，然《金瓶梅》的中帕敘事作為個人敘事表現的意義是，融合傳統觀點和自我認識，表現出物品的物質性和精神性，從中凸顯物質和精神的存在關係，根本上的揭示物質是精神的主導者，雖然精神某方面能夠使用物質，然而，精神最終仍受控於物質。或許宋明理學家反覆地提倡一個形而上的純然之理，並且排除了物質之氣，可能正因為他們發現物質的超然之力，只是

<sup>56</sup> 王正華的觀點是，「日用類書」的定位和意義並非是相關內容的實踐層面，內容可能僅是讀者獲知知識和審美的一種管道，閱讀意義大於實踐意義。參氏著：〈生活、知識與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類書」與其書畫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頁1-85。

<sup>57</sup> 寧宗一，《寧宗一講金瓶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頁4。

不願承認此超然之氣的絕對性，相反地，笑笑生坦然並且直接敘述這個物質之氣的影響作用。<sup>58</sup>

最後，本篇論文從巾帕敘事的角度，探討《金瓶梅》的世界觀及其敘事上的價值，唯一缺憾的是，在論述中無法仔細對比歷史上的晚明巾帕，即便這個對比不僅可發現笑笑生的寫實高度或反諷意味的意義，甚至可從中明白敘事與世界觀的源頭問題。若將來相關研究條件成熟後，希望能夠另闢專文，補充或修正這個缺憾。

---

<sup>58</sup> 學界早已從內容上得出《金瓶梅》反映晚明的物慾橫流，人慾從屬物質追求，不免屈身以求，進而造成許多精神異化的人性現象之說法，如陳東有，《金瓶梅文化研究》，頁 120-164。本文的寫作宗旨不再推翻這項說法，某方面來說，或可視為呼應或補充此說，

## 主要徵引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明〕笑笑生，《金瓶梅詞話》，臺北：里仁出版社，2007。
- 〔明〕馮夢龍，《馮夢龍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
- 〔明〕醉竹居士，《龍陽逸史》，臺北：紅螞蟻出版社，1996。
- 〔明〕沈榜，《宛署雜記》，臺北：新興出版社，1983。
- 〔明〕凌濛初，《拍案驚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清〕李漁，《肉蒲團》，臺北：紅螞蟻出版社，1994。
- 〔清〕曹雪芹，《紅樓夢》，臺北：聯經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1994。
- 〔清〕雲間嗤嗤道人，《五鳳吟》，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6。
- 〔清〕樵雲山人，《飛花艷想》，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4。
- 〔清〕惠水安陽酒民，《情夢析》，臺北：雙迪國際出版社，1996。

### 二、近人專著

#### （一）專書

- 〔法〕牟斯（Marcel Mauss），何翠萍譯，《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臺北：允晨文化文化，1984。
- 〔美〕浦安迪著（Andrew H. Plaks），沈亨壽譯，《明代小說四大奇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
- 〔美〕韓南著（Hanan, Patrick），王秋桂譯，《韓南中國古典小說論集·金瓶梅探源》，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 〔美〕韓南著（Hanan, Patrick），包振南譯，〈《金瓶梅研究》中國小說的里程碑〉，載包振南《金瓶梅及其他》，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 田曉菲，《秋水堂論金瓶梅》，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4。
- 格非，《雪隱鷺鷥：《金瓶梅》的聲色與虛無》，南京：譯林出版社，2014。
- 夏志清、胡益民譯，《中國古典小說史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 張俊，《新批校注紅樓夢》，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 陳東有，《金瓶梅文化研究》，臺北：貫雅文化，1992。
- 陳寶良，《明代社會生活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 閻雲翔著，李放春等譯，《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 黃衛總，張蘊爽譯，《中華帝國晚期的慾望和小說敘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
- 楊美惠，孫珉等譯，《禮物、關係學和國家——中國人際關係與主體性建構》，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 寧宗一，《寧宗一講金瓶梅》，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 劉輝，《金瓶梅論集》，臺北：貫雅文化，1992。

## （二）專書論文或期刊論文

- 胡衍南，〈《紅樓夢》於《金瓶梅》之影響研究〉，載《中國學術年刊》第28期（2006），頁161-184。
- 郭孔生，〈《紅樓夢》手帕意象的解讀〉，《語文建設》第29期（2014），頁30-31。
- 張竹慧，〈從《金瓶梅》看明代社會中常見的資產種類〉，《洄瀾春秋》第8期（2011），頁43-59。
- 張丑平，〈古代小說中愛情信物的文化內蘊與敘事意義〉，《學術界》第174期（2012），頁176-182。
- 張寶月，〈「三言」中定情信物的功能〉，《青年文學家》2010年第1期，頁14-15。



鄭振鐸，《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小說傳統·鄭振鐸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劉相雨，〈因枝振葉，沿波討源——談《紅樓夢》中的手帕〉，《紅樓夢學刊》2014第3期，頁256-269。

### （三）學位論文

呂堃，《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信物》，大連：遼寧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

葛霖，《論狄更斯長篇小說中手帕的功能》，石家莊：河北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2。

萬明田，《中國古典戲曲中的定情信物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0。

### （四）會議論文

高桂惠，〈《金瓶梅》「禮物」書寫初探〉，《金瓶梅國際學術研究討論會論文集》，臺北：里仁出版社，2013。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Andrew H. Plaks. *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Chen. Bao-liang. *History of Social Life in Ming Dynast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4.
- Ge-Fei. *Xue yin lu si*, Yilin Press, 2014.
- Xia. Zhi-Qing. *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1.
- Chen. Dong-you. *Study of Jin Ping mei culture*, guan ya. 1992.
- Liu. hui. *Proceedings of Jin Ping mei*, guan ya, 1992.
- Marce Mauss. *The Gift-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ic societies*, asianculture, 1983.
- Yang. mei-hui,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Yan. Yun-xiang.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 in a Chinese Villag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 Huang, Martin W. *Desire and fictional narrativ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 The Handkerchief Narratives in *Jin Ping Mei*

Fu-Chih Chen\*

### Abstract

In *Jin Ping Mei*, handkerchiefs are a form of material narrative that bears specific meanings. Corresponding with other material narratives in the work, they jointly constitute the narrative style of the author, Lanling Xiaoxiao Sheng, and reflect his world view. In his writing, the narrative meaning of handkerchiefs is first and foremost material, which is manifested chiefly in handkerchiefs' role as a wiping and covering accessory, in which function they react intimately with other materials and form an interrelating material world. Additionally, handkerchiefs are a commodity that are priced and can be traded, which makes them common personal possessions that can be given as presents or exchanged between one another. The second meaning is spiritual, because as a gift, a handkerchief reveals to the readers the feelings of the giver, and more symbolically, it signifies the intimacy between lovers. Therefore, in *Jin Ping Mei* handkerchiefs act as a vehicle of affection for the characters. However, although handkerchiefs bear both material and spiritual meanings in *Jin Ping Mei*, as a whole the material meaning is the absolutely dominant and decisive one. This is apparent from the often material characteristics mixed in the spiritual implications, which is all the more revealing with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 presence of a handkerchief cannot alter a character's mental state so that the spirituality is all but fleeting and the character concerned is still bound to the rules of the material world. In summary, the handkerchief narratives are a revelation of Lanling Xiaoxiao Sheng's view of the mundane world, which he considered

---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Tunghai University.

fundamentally dominated by materials, although he also recognized the influence of spirituality.

Keywords: handkerchief narrative, Jin Ping Mei, material narrative, world view